

(1978-2008)

中国改革三十年

文宗瑜 张晓杰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如果把中國改革放在一個 50 年（1978~2028）的時間段看，中國改革可以分為“兩個 25 年”即“前 25 年”和“後 25 年”。中國改革的前 25 年，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被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認可；中國改革的後 25 年，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為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關注。《中國改革三十年》對中國改革 30 年的梳理、剖析、探究，會讓世界更看得懂與看得清中國的改革。

中國改革三十年

文宗瑜 張曉杰 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改革 30 年/文宗瑜, 张晓杰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209-04966-5

I. 中… II. ①文…②张… III. 改革开放—历史—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6194 号

责任编辑: 周云龙

封面设计: 祝玉华

中国改革 30 年

文宗瑜 张晓杰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70mm × 250mm)

印 张 30

字 数 52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4966-5

定 价 48.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9) 2925659

自序

Zi Xu

中国改革的两个“25 年”

如果把中国改革放在一个 50 年的时间段(1978~2028 年)看,“中国改革 50 年”可以划分为“两个 25 年”即“前 25 年”和“后 25 年”。“前 25 年”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后 25 年”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所以提出一个“中国改革 50 年”的命题,是坚信经过 50 年的改革,到 2028 年,中国基本上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之所以把中国改革 50 年为“两个 25 年”,是因为中国改革的“前 25 年”与“后 25 年”有很大不同,“前 25 年”是侧重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后 25 年”是实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后 25 年”比“前 25 年”作用更大,意义更大,“后 25 年”已经在 2003 年拉开序幕,从“后 25 年”已经进行和正在继续深化的改革思维、改革方式、改革政策、改革效用看,中国再过 20 年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曙光已经显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从事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的学者,从少年时代到大学时代再到大学毕业后置身于中国的改革实践,渴望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不再仅仅是梦想,更多的是变成了一个学者的“行为情结”。自己的幸运,在于能够亲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改革 50 年”,不仅亲历“前 25 年”,而且还要亲历“后 25 年”。自己经过了“前 25 年”,而且目睹和关注了“前 25 年”向“后 25 年”的转型,这或许就是自己从四年前就着手写《中国改革 30 年(1978~2008)》这本书的初衷,20 年后自己可能还要再写《中国改革 50 年(1978~2028)》。改革 50 年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命题,激励着自己坚持完成《中国改革 30 年(1978~2008)》书稿,几年的写作虽然枯燥而疲惫,但是,自己会经常兴奋与激动,为 30 年改革的成就

而兴奋与激动,更为中国今后 20 年改革的愿景而兴奋与激动。因为激动与兴奋,所以就用“中国改革的两个‘25 年’”作为本书“自序”的标题。

改革的前 25 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是重点,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是为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而努力,甚至为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与支付生态恶化的环境为代价。在中国改革的前 25 年中,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改革的后 25 年是全面改革,仍然要继续探索“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是,全面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各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因此,中国在后 25 年的改革中,要勇于并敢于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等内容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后 25 年“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成功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中国会具备比较强的综合国力。

一、中国改革两个“25 年”的划分

2 中国改革启动及分步推进的成功,是一场前无古人、规模空前的探索和实践。30 年前启动的改革,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成就”——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及经济总量排名进入世界前三位。“中国奇迹”和“中国成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没有成熟理论指导、没有稳定参照系学习、没有他国经验借鉴而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所推进改革而实现的。从改革的启动阶段到改革的模式选择阶段,改革带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群众及地方政府站在改革前沿,地方政府在改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不仅主导了改革并全面掌控改革,而且适时推动了改革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转型。中国的改革转型,使中国在一个 50 年时间段的改革存在“前”与“后”的很大不同,根据不同可划分为“两个 25 年”即前 25 年(1978~2003 年)与后 25 年(2003~2028 年);到中国改革 30 年的今天为止,前 25 年改革已经完成,后 25 年改革也已经推进了 5 年。“两个 25 年”的划分,是以 2002 年年底召开的十六大和 2003 年年初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粗线条的分界线。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从 2003 年开始中国拉开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序幕。与侧重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全面改革面临的困难更多更大,因此,其改革的时间也不会少于 25 年。

1. 前 25 年的改革(1978~2003 年)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基于让农民及大多数中国人能吃饱饭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不仅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而且为城市改革探索创造了条件。城市改革推进所遇到的阻力及困难,比农村改革大了几十倍。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扩大地方财权的财政包干等项改革,虽然也为部分国有企业及地方经济带来了活力及效益,但是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后续乏力及严重亏损、财政收入22个月连续下滑等问题也相继出现。紧随其后的价格改革及“价格闯关”全社会总动员,诱发了抢购风潮和挤兑银行存款风潮。在“价格闯关”遇阻及部分群众不满情绪增长的条件下,中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准备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并解决经济难点问题。但是,苏联及东欧的剧变,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下台,使得我们侧重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上半年,是中国改革模式选择阶段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从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的决议,二者之间直接的关联就是中国要选择并推进更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的决议,为全党全国人民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阶段。应该说,1993~2003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化的10年,也是改革的经济成效及成果充分显现的10年。

2. 后25年的全面改革(2003~2028年)

3

经济体制改革带动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及增长,市场力量开始推动中国社会制度转型,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滞后、社会体制改革的徘徊不前,导致制度转换成本急剧上升,社会动荡风险、金融危机风险等开始凸现。是继续加速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适时推动改革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转型?中国改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中央及时而果断做出了全面推进改革的战略决策。可以说,从2003年开始,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后25年的全面改革是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构建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比经济体制改革要难十倍甚至一百倍的改革。后25年全面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经过了5年(2003~2008年)的改革,不仅形成了清晰的改革思路,而且初见成效。

3. 着眼于两个“25年”的改革分段

两个改革25年加起来,是50年;本书是写改革30年,改革30年跨了前后“两个25年”,包括“前25年”和“后25年”的5年。中国改革30年按改革推进的逻辑,划分为四个阶段:改革的启动阶段(1978~1986年)、改革的模式选择阶段(1986~1992年)、改革的全力推进阶段(1992~2003年)、改革的全

面转型阶段(2003~2008年)。除了这四个阶段,还增加了“改革的继续与攻坚”阶段(2008年以后),增加这个阶段是为了与“中国改革50年”的命题相呼应。每个改革阶段章节及各改革阶段的衔接,以经济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事为线索,少许兼涉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力求能够梳理清楚中国改革30年的脉络。为了防止犯简单堆集资料的错误,采取了改革大事件综述与改革评价分析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更像一部中国改革30年的史评。

二、前25年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始,到2002年中国基本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形成了自己的改革道路或模式。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休克疗法”相比,中国自己及全世界更习惯把中国的这一选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路径。以渐进式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不仅被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承认,也得到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可。

1. 经济改革受阻及其选择

中国改革的时间起点公认为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一段时间内,党中央的主要精力仍是用在“文革”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冤假错案平反、党内思想统一等方面,不可能立即形成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及改革思路,党中央国务院对改革的推动主要表现为允许并支持群众和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和自发性改革。由于没有改革的总体方案,再加上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在1978~1986年的改革启动阶段,改革基本局限于经济运行的一些具体环节,着眼于调动群众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提高效率,改革几乎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体制及制度层面。因此,带有很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的经济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和地方政府的改革热情及积极性。从农村的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到城市的放权让利,再到扩大地方财权的财政包干,都显现了比较大的改革成效,群众和地方政府得到了实惠和好处。

但是,非体制性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效益,不断被逐步放开的价格所冲减,国有企业亏损开始扩大,财政收入也一度出现连续22个月的下滑;紧随其后的国有企业承包制,由于是包盈不包亏,也难以改变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局面。国企亏损导致的国企工人收入下降和不断上涨的物价,加剧了工人对城市经济改革的不满。1985~1987年的价格调整改革,并没有改变价格及市场混乱现象,私自提价从东部向西部扩展、从城市向农村传导,相伴而生的通

货膨胀,对中国人的生活及心理带来强烈冲击。面对价格的普遍上涨及部分商品价格的飞涨,“长痛不如短痛”的智囊建议促使中央下决心,进行“价格闯关”改革,寄希望一步到位建立起市场价格机制。考虑到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政府通过广播电台宣传,进行“价格闯关”的全社会与全民总动员。然而,席卷大中城市的抢购风潮与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使“价格闯关”陷入困境,中央不得不暂时停止这种“一步到位”建立市场价格机制的改革。在“价格闯关”遇阻、国企亏损加剧、财政收入放慢等压力下,急躁与焦虑的情绪一度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中央试图采纳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并准备选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联动改革的模式。

2. 政治体制改革的放缓及思考

事实上,在下决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中央就已经在着手做前期的准备工作。1986年9月6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设立,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同时在研讨小组之下设立一个办公室——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资料收集,研究问题,提供思路。经过研究和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早在改革启动阶段的1980年底,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设想,当然,这时用的术语是“领导制度改革”;到1980年代中期,“领导制度改革”的提法演变为“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6月~11月,邓小平在党内外重要场合多次讲到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适应形势”。1987年7月1日,中央决定公开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最初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经调整修改后,于1987年10月在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获得原则性通过,随后召开的十三大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无论是在改革启动阶段,还是改革的模式选择阶段,我国都在尝试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方面是受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当时苏联、东欧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前苏联作为原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其在20世纪80年代大张旗鼓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动作很大,来势很猛,对当时我们的改革认识冲击很大。但是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推进上一直十分谨慎,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经济困难及吃饭问题更突出,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吃饭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吃饭问题,贸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会导致更大的混乱甚至动荡。随着80年代中期一系列经济改革遇阻,改革困难加剧,中央下定决心要启动政

治体制改革。

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不久,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下台,使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比,具有更大的刚性和惯性,尤其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体制,带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性,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政治体制改革则比较难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中央在20世纪90年代及时放缓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智慧。

3. 全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从经济改革遇阻到试图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再到及时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央形成了体制改革的统一认识,经济改革要被推升到经济体制改革层次。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思路并不是十分清楚,也不是十分具体。应该说,在这个重要时期,邓小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力推进。

中国与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同属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与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在1980年代的改革差别,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到了1990年代,却完全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径,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实行的是“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推进的是“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这一时期,在经济领域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经比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走得更远更快。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10年内就大见成效,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更快与发展更好,中国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解决了绝大多数人吃饱饭与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而且表现出比前苏东国家更大的经济成就。就中国与前苏东国家改革给人民带来的利益看,中国人民获得了更多物质利益,中国人民充分分享到了改革的收益。

4. 分税制打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突破口

分税制改革的初衷,或许是为了解决19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财力匮乏及财政弱化的问题。分税制改革不仅实现了最初的设计动机,而且为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总突破口。这个总突破口的打开,无意中使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按市场规律理顺了两个分配关系: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配关系,二是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者的分配关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最大困难与障碍。但是,中国通过分税制改革找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点,在不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地方政府、企业的积极性。可以说,正是这两个分配关系的理顺,使得中央政府能够从经济转型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关注体制性改革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当然,这也加快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步伐及速度。

分税制改革作为总突破口,一旦被打开,其他改革的突破就犹如顺水推舟。在某种意义上,分税制改革的直接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财力,让其可以全面掌控并主导改革,更表现在为199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支持。一是分税制改革支持了金融体制改革突破及银行商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二是分税制改革支持了外贸体制改革突破及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三是分税制改革支持了汇率体制改革突破及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四是分税制改革支持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突破及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快速扩大;五是分税制改革为中国入世创造了条件并增加了谈判筹码;六是分税制改革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创造了条件。

三、后25年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

前25年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在于侧重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一个阶段并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后,应适时推动改革转型。党的十六大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新一代领导集体及时又智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转型,中国步入了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阶段。这次不是简单重提与恢复1980年代末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着眼于如何把中国由一个经济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远大目标,推行全新的改革战略及改革政策,把中国的改革推进到了一个高水平的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改革的“后25年”的开始。到2008年,后25年已经进行了5年,从这5年的改革看,仍然是继续探索“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是,后25年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与改革的前25年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有很大不同;前25年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后25年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稳妥推进并取得成功。积极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意味着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英美的政治模式,中国要能够创造适合自己的政治观念及政治体制。当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是为了支持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为后25年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改革思路,确定了比较明确的目标。从改革的战略思维及布局看,后25年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在整体上表现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及协调一致。

1. 政治体制改革是核心

在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推进中,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核

心地位。2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的是浅层次、相对容易的改革,一些深层次、相对难的改革,往往只是刚开始,甚至有的改革一开始就进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状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高速增长,但是,也打破了平衡,许多社会问题接踵而至,社会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演变为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条件下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不仅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效率,而且加剧了改革继续推进的风险,只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并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核心,才能继续平稳推进中国改革,在改革深化中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化解改革风险。把政治体制改革当做核心,既是全面改革推进的主观要求,也是改革攻坚的客观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是选择了渐进式路径;同样,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要能够成功,也应选择渐进式路径。

中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启动改革的,中国的改革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制度特色、人民思维习惯及行为定势等要素的制约,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不可能从其他国家或地区照搬经验和做法,只能自我探索并勇于创新,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或模式。因此,中国改革不可能基于或拘泥于一种成熟和稳定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是先改革探索,由学者对于已经实施的改革给予理论和逻辑的解释,再经过几年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和文件,创造和总结出新的“提法”和“说法”。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中国特色”,同样也适合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中,无法照搬西方的政治理论,只能是边改革边探索边总结,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当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中,政治智慧的运用也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新一代领导集体所推进的改革策略,是把经济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民生对接,改善民生并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在关注公平和保护弱者的政策开始落实、民生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开始显现的时机,选择一些与社会体制、经济体制联动性较强的环节,适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无论以何种方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不断深化。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保护与维护人权、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写入党的决议,政治体制改革正有条不紊地循序向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当然,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开端。一个好的开端往往会预示着一个好结果。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中,强调:①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②积极向西方宣传中国的政治观念;③打破以行政改革

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④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目标；⑤ 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综合改革实验的重点；⑥ 实现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同步推进。

2. 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

社会体制改革关乎社会公平及社会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全社会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心的是吃饱饭问题，社会公平与吃饱饭相比，居于次要地位。经济发展及经济增长的共同要求，使社会体制改革长期滞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问题开始凸现，某些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混杂为社会经济问题。当改革转型到全面改革阶段，社会问题大多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甚至是社会政治问题，与此相适应，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成为重点。之所以把社会体制改革当做重点，是因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继续放慢放缓极易诱发社会动荡、产生社会动荡风险，影响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只有抓住社会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并实现大的突破，才能维持社会稳定，为探索全面改革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创造条件。

自2003年中国改革转型开始，社会体制改革已经在推进，许多改革措施已经在实施，如维护与保护人权被写入国家宪法，开始关注公平及保护弱者，执政党重视民生及民生问题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配套改革实验区陆续设立，公共政策导向下的公共财政框架及体制构建，让农民分享改革收益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出台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缓解了一些曾一度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对于稳定农民与稳定农村的作用更明显。应该说，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让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社会公平的温暖。然而，这些改革措施还缺乏配套性和统一性，还没有触及社会体制的核心区域。中国社会体制及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制改革深化及突破的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社会运行机制，实现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

社会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全体社会公众，而且涉及所有既得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其改革的阻力及难度不亚于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社会体制改革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晰，新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在从观念转变着手，引导全党及各级政府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重新定义及再认识，把民生及民生问题上升为执政理念，通过制定和实施“让穷人赚便宜”及“尊重并保护穷人”的政策，实现社会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从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及目标看，改革应着眼于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平等化，分步建立并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制，赋予民众更多更大的知情权，充分保障人口的自由迁

徙权。

3. 经济体制改革要突破

改革转型是在侧重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下而实现的,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比,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早、范围广、力度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建立,经济体制改革要集中进行深层次、重大问题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能够突破已有思维定式和改革方式。自2003年改革转型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主要从两大领域着手,一是国有企业的全面改革,二是全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改制上市。两大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国有企业全面改制,不仅大大减少了国有企业数量,实现了国有资本的集中,而且强化了国有资本在涉及基础设施、国家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控制能力,提高了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盈利能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通过财政注资、剥离金融不良资产、完善公司治理、在国际国内证券市场上市等措施,不仅提高了金融资产的质量,而且提高了金融业抗御风险的能力。应该说,中国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能够保持金融秩序的稳定,实现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营,主要得益于2004年开始的全国商业银行改制上市。整体而言,2003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极大提高了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

但是,国有企业的全面改制和全国商业银行的改制上市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突破的第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实现更大的突破。其一,是高度清晰的现代产权制度建立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产权要清晰;二是产权要受法律保护;三是产权能够交易。就现代产权制度的三个特征而言,中国目前仍有大量的产权需要进一步清晰,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只有着眼于这些产权的高度清晰,才能有效防止权钱交易的“寻租”腐败,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条件。其二,是农村土地分类改革及宅基地改革。土地资本化及其级差地租升值,强化了各种利益集团对土地及其价值的争夺甚至是掠夺,充分保护农民利益及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制度,要求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村土地分类改革与城乡居民宅基地改革结合起来,有益于保证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会公平并推动实现城乡房地产市场一体化。其三,是“民富”及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制度的建立。中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实现了国富;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突破,应是着眼于民富,让城乡居民尤其是让农民及城市低收入居民富起来。实现民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在理念和观念突破条件下的制度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建立起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居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要有制度保证,既要保证机会公平,又要保证收入增长。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可

以强化居民消费的“底气”，提振内需及消费。

四、改革 50 年后的中国

中国改革有时间起点，但是没有时间表，也没有最后期限，谁也不会某一天宣布中国的改革使命已经完成。把中国改革放在一个 50 年的时间段看，也不是要宣布中国的改革使命已经完成，而是为中国改革确定一个中长期目标，经过 50 年的改革，中国基本上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不仅看经济总量的排名，而是看综合国力，看中国在物质、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改革 50 年的中国，经济总量会排名在世界第二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发展到了比较高水平，具备了比较强的综合国力。就综合国力而言，体现在各个方面。

1. 人民币跻身于世界三大货币区

货币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人民币应该有足够强的竞争力。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总量，既要求提升人民币的竞争力，也为人民币竞争力提升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排名第三、第二时，中国经济总量会极大提高人民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能力。人民币竞争力提高，离不开货币市场及金融业的发展。要着眼于人民币对全球经济增长及全世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影响，制定货币市场及金融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拓宽人民币结算网络的覆盖范围，提高人民币结算的便捷程度，有利于世界各地机构及个人选择使用人民币。为了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引导机构及个人选择使用人民币，可考虑并着手推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货币统一。如果能够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实现货币使用的统一，将极大提高人民币的影响力及国际地位。当然，三地货币使用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许多技术性的支持。无论其是一个长期目标，还是一个中期目标，都应努力推动并实现。依托三地货币使用的统一，扩大人民币在东亚、东南亚及整个亚洲的影响力，让更多亚洲机构及个人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及贮藏财富的货币。当然，人民币也要努力扩大在非洲、北美、欧洲及其他区域的影响力。通过人民币影响力的扩大，使人民币跻身于世界三大货币区，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货币支持。

2. 中国证券市场具备国际竞争力

证券市场是虚拟经济的核心。知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进步及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进一步强化了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依赖，虚拟经济往往决定并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实体经济全球化，而且表现为虚拟经济全球化。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其证券市场

应该具备国际竞争力,其对全球虚拟经济应该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要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竞争力,必须推动证券市场的开放,尽快实现两个直接开放,其一,是中国证券市场对外企业直接开放,所有国家或地区的企业都可以选择来中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二,是中国证券市场对外投资者直接开放,境外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都可以直接从事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当然,第二个开放要分阶段完成,而且还要以外汇体制改革深化为支持条件。通过两个直接开放,把中国证券市场打造为一个国际化的证券市场。除了两个直接开放,还要加快资产证券化的进程并进行创新,扩大品种、类别,增加证券交易的活跃性及数额。美国 2007 年的次贷危机及其 2008 年所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不在于资产证券化的创新,而在于金融监管及部分利益集团对虚拟市场的刻意操纵。中国不仅不应该因噎废食,而且要从中吸取教训,在金融创新中强化监管。

3. 中国设备制造及中国服务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中国制造”尤其是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及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多年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及出口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快速回落并拖累实体经济,已充分说明了“中国制造”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仍然离不开也摆脱不了“中国制造”,但是,“中国制造”的内容要发生根本性改变,要由“工业产品制造”转型并升级到“工业设备制造”。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维护两大工业体系的完整及独立。两大工业体系的完整及独立事关国家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中国制造转型和升级的目标是中国设备制造。中国设备制造应着眼于重大装备、重大成套设备、重大实验设备等的制造,从而争夺全球设备制造的制高点。与中国工业产品制造及出口转型密切相连的,是依托技术进步,实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业链条的衔接,提高并强化第三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联动效应,发展并放大“中国服务”的价值。“中国服务”不单纯局限于服务业,而应依托技术进步和凭借劳动资源优势,为全球的第三产业甚至第一产业的专业分工提供链条衔接的服务。“中国服务”只有影响全球第三产业甚至第一产业的专业分工及增值,才能形成相对竞争优势。

4. 中国能够形成并向世界展现其价值观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能够形成并向全世界展现自身的价值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激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中国向世界输出工业产品的能力不断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同步增强。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中国,中国也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分影响世界。只有实现从工业产品输出到价值观展现的跳跃或提升,中国才能更充分影响世界,当然,也才能让世界各国从内心深处接纳一个强大的中国。因此,应该把中国价值

观塑造及展现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然,中国要能够展现价值观,就要先花时间与精力进行国家价值体系构建及核心价值理念培育。

5. 中国海权战略得以充分实施并充分发挥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必须能够充分实施海权战略。中国海权战略是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资源依赖性所决定的。所谓“海权战略”是指中国要通过海军、空军装备能力的提高,发展一个强大的海军、空军,使中国具备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海域打近海或远洋进攻战的能力,推动中国国防战略转型。当然,中国的海权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并不是走出去“进攻”,而是要绝对安全的“防范”。“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成功,使中国越来越依赖外部资源和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如果不能在海洋上尤其是在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的海洋运输通道上取得主导权,则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甚至会导致不可控的经济风险。因此,要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中国海权战略。中国海权战略的实施,不仅要求加快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的进程,还要求加快中国军人知识化的进程。相比较而言,军人知识化的意义更大、作用更大。与军人知识化相联系的,是中国要逐步推进并实现军人职业化。

改革 30 年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改革 50 年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谨以此书为中国改革 50 年的愿景而祈福!

文宗瑜
2008 年 12 月

目 录

Mu Lu

自序 中国改革的两个“25 年”/1

第一篇 改革的启动(1978~1986 年)

第一章 从抓整顿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土地革命时期所确立的对待农民的政治策略/4
- 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农民土地的承诺及兑现/6
-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收回农民土地所有权/8
-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收回农民土地使用权/10
- 农民迫于吃饭生存需求而自发进行的改革/12
- 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4
- 对农村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式认可及肯定/16

第二章 反思并否定“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 关于“两个凡是”的反思及其批判/20
-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22
- 关于“资本剥削人”的政治经济学反思/24
- 西方经济学进入大学课堂/27
- “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及实践的终结/30
- 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32